

【家风漫谈】

用言行来影响

□星袁蒙沂

父母对孩子的影响,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。无论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,都将影响孩子一生。我父母那代人,教育孩子只用一个字:打。这种方式是我深深憎恶的。有时和父母闲聊,聊到我小时候不听话挨打,我常补上一句,你们的做法是不对的。

与村里其他孩子比,我挨的打算是少的。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,动不动就挨父母打。那一代人没什么文化,教育孩子除了打就是打。不听话,打;学习成绩不好,打;和别人吵架,打;没深没浅去河沟里洗澡,打;干活没干好,打。可是,棍棒教育,并不都像媒体报道中“狼爸”、“虎妈”那样有“成绩”。相反,我们村挨打越多的孩子长大后越没见有什么出息可言。

儿子出生后,我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俗话说“穷养儿,富养女”,我该怎样教育孩子呢?纠结归纠结,我对棍棒拳脚教育毫不支持。小孩子犯错在所难免,犯错就打,本身就是宣扬暴力。对待孩子,不能溺爱,也不能太苛刻。我对儿子的态度是自由发展,加以引导,适度严格。

一岁多时,儿子因为牙龈痒,喜欢咬东西。听说母亲背着儿时,他趴在母亲背上经常张嘴就咬。有次妻子背他,我正好在旁边,他张嘴就啃住妻子肩膀上的衣服。我看到后叫了声他的名字,然后拽过他的小手,拿捏着力度朝他手背上拍了一巴掌。这一巴掌只让他觉得疼,不会伤到皮肉。我还严厉警告他,不准再咬人。小孩子可能不懂,也可能记不住多久,只求他暂时别再咬

人,慢慢总会记住的。

后来听母亲说,他再咬人或淘气时,母亲就指指他的手,他立即就老实了。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知道,不听话就打。他嘴里说着“爸爸——打,打”,还模仿我当时打他的动作。怎么打的,打的哪一只手,打的什么位置,他都知道。我只是轻轻打了他一下,想教育教育他,儿子胆怯的样子还是刺痛了我。

孩子小,很记事也很听话,出生两年多我就打过他那一次。在孩子的教育上,我始终抱着应该用言行正确引导的方式来对待。儿子和我在一起玩耍的时候,有时一不小心跌倒了,如果不是很严重,我就在一旁鼓励他:“儿子真棒,摔倒了都不哭,快爬起来!”有一次跟我一起踢球,他踩到球顶上一屁股坐了个空,狠狠仰

倒了,后背砸到花盆上。我本想鼓励他,可能实在太疼了,儿子没等我开口,哇一声大哭起来。母亲跑过去抱起来哄他,我则笑着说:“儿子,咱是男子汉,可不能哭啊!”他看着我啊啊了两声,瘪了瘪嘴,二十秒内就不哭了。

忙时我和妻子一个多星期才回趟老家。一次在电话中告诉儿子晚上一定回去看他。下午妻子却突然有事,我们没法按时回去了。妻子说,儿子虽然小,也不一定记得,可承诺的事就必须做到。我本不想回去的,让妻子这么一提醒,怕教坏了孩子,只好撇下妻子独自回了老家。

做父母的就应该事事作表率。当然,父母平日的言行不可能原模原样遗传给孩子,但却能在潜移默化之中传递给孩子,影响到他们的未来。

1994年6月19日,我亲爱的母亲张申一无疾而终,安详离世。转瞬间,20年过去了,她的音容笑貌依然久存心间。

母亲1924年生于湖北武昌,幼年丧母,外公把她送回外婆的故里苏州,在那里她度过了少年时光。后来外公在天津中国银行供职,担任过襄理(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行长助理)。母亲再次回到外公身边时,已经有了新的外婆。

1943年,19岁的母亲考入北平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——辅仁大学,就读家政管理专业。由于辅仁大学采取全程英语教学,母亲的专业知识学得如何不得而知,倒是掌

【逝者背影】

我慢慢

读懂了母亲

□陈锐

握了比较扎实的英文。母亲毕业后在天津一家英文报馆觅得一份编辑的差事。工作一年后,母亲进入一所小学当了教师,至此开启了为之奋斗终生的教学生涯。

母亲以全日制大学毕业的学历从事小学低年级教育工作,在以前是十分罕见的。但她从不小看这份工作,手书的教案有数百万字之多;她去过的山村教学点数不胜数;辅导过的基层教师也有数千人之多。

“文革”期间,母亲难逃厄运,遭受令人发指的身心凌辱,即便如此,她仍然坚守在三尺讲台。山东省首批特级教师、首位教授级小学教师、全国三八红旗手、两届全国人大代表,这些令人炫目的荣誉应该是对母亲一生最大的肯定和褒扬。

直言不讳,有傲骨、无傲心是母亲的人格特点。上世纪50年代,大量苏联专家进入北京市教育领域,照搬苏式教学管理方法成为一时潮流。当时已经成为北京市屈指可数的二级教师的母亲据理力争,坚决反对机械照搬,连苏联专家也觉得母亲的观点不无道理。但是,在极左的年代,母亲因之被打成右派。

亲情、爱心伴随着母亲终生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母亲随打成极右分子的父亲,从北京下放到沂蒙山区,在都市长大的大家闺秀一夜之间成为乡村教师。当时,沂蒙山区的农民生活极度贫困,衣食无着的比比皆是。母亲在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的同时,几乎倾尽所有个人收入,帮助贫困学生渡过难关。

那时,我们周围的不少家庭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,母亲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,鼓励他们的孩子发愤读书。当时,我家的餐桌边经常有新面孔,我和妹妹的衣服成为多人共用的“公用品”。有些生活窘迫的老师张口借钱,母亲也会倾囊相助,但是大多有借无还。

母亲晚年仍为举办亚运会、植树造林、扶贫开发等多项公益事业捐资助物,而对自家的儿女,母亲却十分“吝啬”。1979年我结婚时,她仅仅拿出500元钱,供我们回浙江老家祭祖,其他一切开支由我们自理。她与父亲一生中捐献的款项在6位数以上,去世时留下的存款却少得令人难以置信。由于父母一生中帮助过的人不尽其数,时至今日,每逢清明时节,仍有不知名的人到他们的墓前祭奠。

晚年时,母亲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。1992年,履行完最后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能的母亲,婉拒了组织上在临沂为她精心安排的生活待遇,来到日照与我们共同生活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,她开始少量吸烟。有时站在自家的阳台上,手拿一支香烟,远眺一望无际的大海,一言不发,一待就是很长时间,与她原来健谈的性格形成极大反差。我曾问她:您在看什么?她静静地回答:“Skyline. There is your father.(天际线,那里有你的父亲。)”如今已逾花甲的我终于慢慢地读懂了这句话的含义,也慢慢地读懂了母亲的一生。

【亲情相册】

区志航一家



□区志航

我的母亲出身大户人家,她的父亲是清末民初水师好几任舰长,从小接受开明的教育,已经有机会拍摄生活照。上世纪40年代,母亲成了广州著名商业电台的主播,父亲则是电台的兼职高管。1962年2月18日,一家七口合影。

2013年9月19日是中秋节,四代同堂的一家人聚在一起,拍了这张全家福。2013年末,母亲安详辞世,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拍照。

【我家家训】

两次难忘的教诲

□张凤英

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母亲在不同时期都会给我不同的教诲。现在回想起来,有两次教诲让我受益终生。

第一次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。老师教我们学习九九乘法表,要求我们在放学以前背诵下来,否则不能回家。我从小对数字不够敏感,背了一下午也没背过,同学们都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回家了,我却留下来继续背诵。等我终于把那九九乘法表背下来时,天色已经黑了。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。母亲问:“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呀?”我把原因告诉母亲。母亲说:“你听说过笨鸟先飞这句话吗?你就是那只笨鸟,你要

想和别人一起到达目的地,你就必须先飞。就是说,在老师讲课以前,你要先看一遍新课程,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,老师讲课的时候,你就会特别注意听讲,这样你就不会被老师留下了。”

听了妈妈的话,我养成了预习的好习惯,不久我就成了一名优秀的学生,还被评选为学习标兵。从小学到大学我都坚持这个好习惯,所以老师们总是发现我掌握新知识特别快,经常表扬我聪明,还号召其他同学向我学习。可是我内心深处知道,自己是一只笨鸟,我是用母亲的“笨鸟先飞法”取得成功的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我也觉得自己应该“笨鸟先飞”,在领导安排工作之前就做好准备,等领导安排以后,我会很快交出策划方案,于是得到了领导的重用。

母亲对我有重要意义的第二次教诲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。记得那是一个气温上升的春季,我穿着毛衣毛裤到同学家玩,天气很热,我就在同学的家里脱了毛裤,只穿内衣回了家。母亲看着我抱着毛裤回来了,非常生气地拿起扫帚朝我打过来。打完之后问我:“你说妈妈为什么打你?”我摇摇头。母亲说:“女孩子怎么能

在别家随便脱衣服?人家家里有哥哥有弟弟,你知道女孩子这样就是不自重吗?”接着,妈妈给我讲了女孩子要自重、自爱、自尊,并且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。对此我印象十分深刻,这也成为我后来的行为准则。正是因为这样,我在职场奋斗多年,和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,但一直洁身自好,成为同事、婆婆和老公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好同事、好媳妇。“做女孩要自重”就是母亲对我的第二个重要的教诲。

三十年过去了,如今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。但是她对我的教诲却仍然铭记在我的心中。正是听了这样的教诲,才使我的生活平安、幸福。

【空巢里的孝心故事】

送给母亲的礼物

□纪慎言

又有两三个月没有回老家看望老母亲了。趁着儿子放假,便一起开车回了趟老家。

母亲今年88岁了,身体没有大毛病,吃饭也很好。前两年眼睛患了白内障,我出资由弟弟们带她分两次在县医院做了手术,视力已经没有问题。现在唯一的毛病是耳聋,与她面对面说话时也得大声点儿。

我的耳朵也有毛病,右耳基本失聪,左耳勉强对付着使用。许多人劝我好好治,我不以为然。我的观点是,眼不见心不乱,耳不闻心不素。该让你听到的,你再聋也躲不过去,譬如

缴费。儿子们孝顺,大前年赶上“父亲节”时,大儿子花两千多块钱给我买了个德国产的助听器。我试了试不行,太吵人了,许多不该听的听了,心乱!于是,放在抽屉里一直闲置。

这次回家,除了该带的东西之外,我悄悄地把那个助听器作为礼物也带上了,而且还有跑去百货商店买来的助听器用的微电池。我想给她老人家一个惊喜,让母亲也享受一下高科技带来的快乐。

但是,回家后我把带来的食物一放,又把一叠百元大钞给了母亲,却迟疑了半天,最终

没有把助听器掏出来给她。

父亲逝世后,母亲离开了那个呆了几十年的老窝,轮流跟着三弟和四弟生活。我的弟弟、弟媳都很孝顺,两家的吃住条件都很优裕,这让我感到很宽慰、舒心。但是我知道,母亲头脑清晰,心里一点儿也不糊涂,而且老人还爱管闲事,见到或者听到什么不随心不合意的事情就喜欢唠叨,不说出来就自己生闷气,说出来就又能让儿媳妇们郁闷。所以,我最终决定把助听器又带了回来。我以为,老母亲有一双亮眼能看路,看东西就足够了,耳朵听不

清有时反而是好事,能少操闲心,少管闲事,少说闲话,少生闲气,多享清静,多得快乐。

虽然没有把准备的礼物送给母亲,但我还是暗自高兴,因为我最终送给了母亲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:安宁。

征文投稿邮箱:qlwbxiaoxin@163.com

